



宗璞

1979年12月6日,我因编辑宗璞中篇小说《三生石》,应约到北大燕南园谈稿。

燕南园是北大校园内最幽静、风景最美的住宅区。哲学家冯友兰住57号,前后左右的大学者有语言学家王力、哲学家汤用彤、物理学家周培源、化学家黄子卿、人口学家马寅初、历史学家翦伯赞、美学家朱光潜……可谓大师云集之地。邻里之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那天我沿着燕南园东面的小径南行,尽头就是冯友兰的住宅。一株高大的枫树,掩映着灰褐色砖门楼,门楼前蹲着两只可爱的小石狮。推开深棕色栅栏门,跨过中间微有凹陷的门槛,就进入院子。院内最显眼的是三棵松树:一棵高大,直指天空;一棵树身弯过去,覆盖着房顶;另一棵平伸作伞状,可当凉亭。冯大师曾撰文曰:“庭中有三松,扶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因名寓所为“三松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倚墙向上攀援的藤萝树。几支胳膊粗的深灰色枝干扭结、盘绕着向上向上向上,一直缠住了矮墙外一棵高大、挺拔的槐树,显示出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我心想,这藤萝开花后从高处垂下,将是一幅多么美妙的花帘。

冯家住宅呈L形。向南一转,穿过月亮门,便是一条甬道。宗璞听见脚步声推门向我迎来。我见她衣着朴素,面容端庄,中等稍高的个儿,戴一副近视眼镜,低声细语跟我打招呼。她引我穿过立着许多书架的走廊,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摆着几个沙发,靠墙有一架钢琴。坐下后我说:“我知道您喜爱西洋音乐,所以在《红豆》里让女主人公江玫弹贝多芬的《月光曲》,在《弦上的梦》里令梁遐用大提琴拉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协奏曲。”宗璞笑道:“作者喜爱的人物身上,总免不了留下自己的兴趣和身影。音乐是上界的声音,爱音乐者有福。”

隔壁冯友兰先生听见我们交谈,便从他的书斋来到会客室。我眼前一亮,一位80多岁的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银髯飘拂,一副仙风道骨。在我心目中,大学者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我忙赶过去躬身问候:“冯老,您好!久仰久仰!”冯老伸臂跟我握手。他的手有力且温暖。我景仰地说:“冯老您把哲学说成是教人系统反思的思想,通俗简洁,深受教益,犹如茅以升说桥梁力学原理全在小板凳上。”冯老头点说:“大道至简。哲学家是专门从事思想的人。你们谈,我去忙我的事。”说罢便回到他的书斋。

会客室墙壁上挂着一个拓片,是魏王写的“雪亮”两字,字迹古朴圆润。我不知出自何典,猜想它可能是魏王号召官员们为政清廉、多替百姓做好事的意思。沿墙立着一排书架,上面整齐插着《册府元龟》《全唐文》《李白全集》《李义山诗集》《拜伦全集》《济慈诗集》,各种中外文书籍、词典。我说:“您家真是开了一个小图书馆,坐拥书城

照相馆的生意已经被挤得十分惨淡,镜头冷冷的没有多少表情,大多时候都是睁着一只眼睛在睡觉。顾客进照相馆也不再像过去,虔诚庄严,攒足表情,而是多了些随意。

我坐下来。面灯打开,镜头惺忪醒来,懒洋洋的。

“别动!”照相的中年妇女说。

咔嚓一声,我先是被吸入镜头,然后顺着相机的尾线走进了电脑。电脑里,另一个我一脸的沧桑,与我静静地对视。

我被吓着了。横七竖八的皱纹,下坠的眼袋,散落的黑斑点,毫无生气的土黄色,刺刺楞楞干巴巴的头发……

我想走开,彻底走开。如果不是各式各样的表格,需要白底、正面、免冠的近照,我怎么可能走进来,亲眼目睹这些死去活来的生活折磨?

中年妇女转脸朝我一笑。我看她一只手轻松地压上鼠标,电脑上一个虚拟的小箭头便轻松地活动起来。它很有魔法,眼见它毫不费事地就抹平了皱纹,消去了眼袋,抠掉了黑斑,加粗了眉毛,修整了发型,擦敷了面光。然后,又把他的嘴角轻轻往上一挑。一张年轻的脸立马充满了隐隐的笑意。

这人我见过啊!我能肯定这一点,但不是现在,至少是十几年前吧,或许更早。他那时常穿一件深灰色西装,像模像样地扎着领带,衬衣花不楞登,七分活力,三分张狂,牛皮哄哄,自以为是一副认定世界是他的架势。于是,早上的太阳下午的落日,大大小小的会议,成堆成摞的文件,休息日躬身而作,半夜里突然电话铃响。沉舟侧畔千帆过,天生我才必有用。工作时,领导说“很好”。提拔时,领导说“你太单纯”。同事一挤兑,领导就别有深意地问:“你是不是有怀才不遇的感觉?”他赶紧表白:“没有。我只是想痛痛快快地撒泡尿。”妻子用剪刀三下两下剪去他的翅膀,然后告

生活质感

我被关进了电脑

□ 张世勤

诉他说:“你应该学会飞翔!”他只能裸着双肩回答:“不,我喜欢匍匐在大地上。”

他其实认真地问过自己:“你是少年Pi吗?”然后他又认真地自己做答:“不,我是老人与海。”这个回答是中肯的,因为他的船也曾驶向大海,但在与大海搏斗了无数个昼夜之后,他跟海明威一样,也是带回来了一副大鱼的骨架,而不是一条完整的大鱼。那么,那些鲜美的鱼肉到底哪里去了呢?不好意思,全被生活的大鲨鱼给啃了。

船旧了,人老了,鱼馊了,但大海依然年轻,波涛依然汹涌。

如今这一切,都被一枚小小的虚拟箭头给彻底改变,它一笔抹平了岁月的鸿沟,让所有的过往统统葬身大海。

望着电脑里年轻的他,我跟他递个眼色,我想跟他调换一下位置。我觉得自己已没有脸面再走出照相馆的这扇小门。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沉稳地从电脑里走出来,扯一扯衣襟,拢一拢头发,拉开房门,自信满满地走上大街,混入了人群。三分木讷,七分老成。看得出,世界不是他的。但他毫无疑问,却是世界的。

我一脸沧桑地躲在电脑里,与照相的中年妇女对视着。我想跟她说句话,中年妇女却板着脸,面无表情,咔嗒一下,她把电脑关了。

我想跟她说的是,修饰别人,你是把好手,但那不过是工作。修饰自己,你可能还没学会,但那是你应有的生活。想她的少女时代,一定也春光无限、灿烂无比,甚至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们完全可以一同追忆那些花红叶绿,那些似水流年,可她咔嗒一下把电脑关了。

我被关进了电脑。

所以,你如果现在遇见我,那应该是另一个我。也很可能,他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印象

兰心蕙质 品格高雅

——记宗璞

□张守仁

告别“三松堂”,回望院中松柏,默念孔子的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二

10年后即1989年深秋,我去南京拜访《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作者张弦。他当时住在清代诗人袁枚名宅“随园”旁边。张弦的女儿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快毕业了,正在撰写有关宗璞的毕业论文。他知道我过去宗璞的家,编过她的作品,便要我给她女儿介绍一下宗璞的情况。我说,我记住宗璞的名字,始于1957年7月她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红豆》,从此一直关注她的创作。她各种文学体裁都有优秀作品问世,且精通英语,有译诗出版。中国古典诗词她娴熟于心。尤爱《红楼梦》、苏东坡诗词、西洋古典音乐。简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弦和他女儿认为我对宗璞比较熟悉。其实,一直到今年春天,我花了近两个月时间,重新细读了我收集到的宗璞所有作品,包括《野葫芦引》四部长篇中已出版的三部、几十个短篇以及100多篇散文,才可说我对她的身世、创作有了深入的了解。宗璞长期生活、学习、工作在清华、联大、北大、文联、作协、社科院等文化单位,故大都写的是知识分子题材。她的系列长篇写南迁的大学教授们,在衣食住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授业育人的感人事迹。散文集抒写燕园美景、湖光山色、四季花信、风庐依旧,域外随笔、学者风采。《三生石》《弦上的梦》则描述在“文革”岁月,知识分子们被批斗、被凌辱、被关押,以及从困感到觉醒的过程。还纵笔描绘一代大儒历经磨难犹潜心学术,显示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怀。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文笔细腻,明丽含蓄,委婉有致,气韵独特,是当代文学园地里一朵芬芳馥郁的花魁。

三

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长篇,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背景。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8年中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黄昆等。在闻一多和沈从文教授熏陶下,出了文学家汪曾祺。联大后期有800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为国献身。它的伟绩,可歌可泣,永垂史册。

1988年,宗璞60岁时冯友兰赠给她一副寿联:“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赞美女儿描写南下学者在昆明为保护中国文脉不断而艰苦卓绝地守卫在教育领域的动人故事。《野葫芦引》有众多物和事件,描绘了世情百态、生离死别、亲情爱情、侠义豪情。第一部《南渡记》叙述南渡时跋山涉水、转辗迁移的艰辛历程。第二部《东藏记》中写主人公孟樾教授为避日寇频繁轰炸,只能在野外坟堆上或者月光下、池水边授课。孟家避居东郊龙尾村,只能挤住在农家简陋小楼上,楼下就是猪圈,臭气熏天,家人发现劣质大米中有了肉虫,随手从楼板缝里扔下去喂猪。孟教授小女儿孟嵋身上明显有作者宗璞的影子。她做饭时背诵《吊古战场文》,遇屋子漏雨便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诗句。第三部《西征记》中还描述孟嵋到滇西远征军医院当护士,精心护理伤员,并目睹了腾冲战役中抗日健儿英勇牺牲的悲壮场面。

从《东藏记》开始,宗璞疾病缠身,父亲去世,心情悲痛,目疾加重,告别阅读,只能靠口述写作,其艰难拼搏的精神,可以想见,诚如她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四

我近年选编、出版的《世界美文观止》,辑录了古今中外名文160篇(中、外各80篇),其中有宗璞的《紫藤萝瀑布》和冯友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紫藤萝瀑布》寓意深厚。它通过北京大学校园里“文革”之中与之后,花树的衰与兴,曲折表达了知识分子们遭受迫害又获新生的历程。改革开放后,北大校园里受摧残的紫藤萝重放光彩,“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还说紫藤花“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作者在文中不仅运用了比喻、拟人、对比的手法,还动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段。编选此文,我不禁回想起1979年我拜访“三松堂”时看到的那架斜身倚墙、扭结着盘绕向上、紧紧缠住大槐的藤萝。

冯友兰教授曾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纷纷北归,遂推荐这位大

手笔撰写碑文,刻石纪念。冯大师写的碑铭曰:“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峨眉。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碑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颂扬了中华民族抗日取得的伟大胜利,抒写了京津三校同甘共苦的兄弟情谊。全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丰沛,金声玉振,实为我国20世纪难得之雄文。

《观止》编成、出书前,我打电话给宗璞,希望取得作者授权。可是电话一直不通,向她原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了解,才知“三松堂”原址已改成“冯友兰故居”,宗璞离开了燕南园57号,已迁至北部普通单元楼居住。闻此,我依然若失。

五

宗璞温文尔雅、高洁如玉,所著不同体裁文学作品连连获奖。她的长篇小说《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三生石》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丁香结》获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大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十月》首发的短篇小说《鲁鲁》,描写一只聪明活泼、有情有义、忠于职守、充满人性的白狗。它被编入教科书后,受到万千少年男女持久喜爱。宗璞尤善诗词,兼事译介。我做文学编辑工作已近60载,接触当代女作家很多,但像宗璞那样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气质高雅的女士,迄今还没有遇到第二位。

她长我5岁,已届米寿之年。无论哪方面她都是我的老师和楷模。宗璞的为人、为文,博得一致赞赏。江西作家胡辛赞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北京评论家何西来说她的作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上海李子云则誉她有“兰气息,玉精神”。连比她大15岁、博闻群书的文坛名宿冯亦代也赞美说:“宗璞有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自己又是个小说家、诗人,因此她能把中西古典文学的含义尽化为诗,从而以之入文;加之她的敏捷,这是我辈凡人所不能企及的。她的文章看来平平淡淡,但其中跌宕迂回又不是粗心的人所能把握的,只有在读者的细心体会中豁然开朗,而捕捉到她命意之所在。”

诚哉,斯言!信哉,斯论!

阅读

人在字里行间

□子张

亲切

“扒头”、“雨搭”、“就”、“偎边”、“麻拉”、“炝锅”、“碍事”、“唔噜”、“够呛”、“宽绰”、“娘娘们们”,这些山东方言特有的语汇,是我从刘可牧先生的个人回忆录《七千里流亡》中看到的,也是读这部书稿过程中令我时时感觉亲切的一个因素。我不止一次说过,标准化的“国语”也罢,“普通话”“世界语”也罢,从被“创立”之初,就宿命般地失却了原生态语言之文化性、艺术性的成分,而只能成为一种仅具交际功能的工具性语言。这种语言,与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隔膜,因而也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很难让阅读者产生纯粹的语言亲切感。

刘可牧先生的《七千里流亡》与抗战有关,可并非正面写抗战,诚如书名所云,记录的是战争背景下的流亡生活。写战时流亡,早就有林语堂的小说《瞬息京华》、路翎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以及穆旦的诗《出发》《原野上走路》;写山东师生的流亡,也有李广田的《流亡日记》和吴伯箫的散文《记乱离》《引咎篇》。不过,刘可牧先生的回忆录虽然出得迟,而规模却甚大,细节也更多,尤其所记录的从“省立一中”到“国立六中”这些山东中学师生达四年,漫漫七千里流亡途中所见、所做、所思所想,构成了活生生的历史肌体,而又因了历史本身的延伸和生长,勾勒出书中人物的去向和“下落”,于参差错落中凸显出历史的有情与无情、荒诞与真实。由这种

种历史细节构成的鲜活记忆,已足以使其不朽。

是什么动力驱使刘可牧先生于老年写完这部回忆?原来早在当初流亡安顿下来后,就曾由几位老师编辑过一部师生流亡回忆,可惜因为书稿丢失而终未面世,“填补这个缺失是父亲晚年的一大心愿,他尽了心力,应该说这部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他的愿望”(刘庚子“代后记”)。早在几年前,我就看过这部回忆录的打印稿《在风砂中挺进》,这个书名正是丢失的那部师生回忆的备用书名。

而我之重读刘可牧先生回忆录的感觉,仍不妨以“亲切”一词加以形容。盖于我而言,刘可牧先生乃为故人,他书中所记录的济南、泰安这些地方也属“故地”,他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无论是旧时山东教育界的官员、教员,还是与刘可牧先生相熟悉的师友如李广田、杨竹剑、晁岱岱,也都算我的“大老乡”,后二者更是与刘可牧先生一样为我所熟悉的前辈。如果说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在刘可牧先生生前,我没能找机会当面向他了解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更多细节。

既然长者,鲜活史册,其人可亲,其书有味,真乃吾鲁人雅人深致者也。

情怀

前得北京朱航满先生赠书两种。其一为所编《2015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新书。该书收录33位作者随笔,固然不能轻易结论“全年佳作尽收其中”,而作为个人编选,自有其属

于个人的选择视角和特点,读者自当留意与会心,无须挑剔。余平日翻杂志的时间甚少,得此一编,眼界顿开。

另有航满个人新集《书与画像》,2013年出版,收作者49篇“书与人”随笔,及孙郁、李静序文。前曾于《边缘·艺术》读过航满记诗人邵燕祥一文,沉着质实,印象殊深,此次当再仔细品读。

《劫后传薪火》一篇,由其所涉及的“学术传承”话题联想几点:一、传承方式多种多样,除“传技”、“传道”区别外,亦有面授、函授和亲传、隔代传等;二、我说的函授一种,包括以通信和读书方式得老一代文化人教益;三、这些传承方式揭示了表面上的文化中断背后的真相,即坚韧的文化血脉潜流始终都存在,都不会真正中断;四、我的经历证明这种传承关系的确可以建立,比如从大学老师那里与上一代甚至更老一代学人建立起精神关联,再比如自己由现代文学教学而有拜访冰心、施蛰存这些新文学第一代第二代文学家的机会,又与三四十年代更多诗人通信、认识,正是这些机缘,慢慢在我身上产生了些许民国现代文化之印痕。

此后不断继续将全书粗略浏览一过,印象殊好,屡有会心处。最好的是作者那一份温暖的情怀,对所写人事皆抱持动人的体贴心意。其实,文字之美之雅之味,并非独立于作者之外的无机存在,实乃属文写作者全人格丝丝缕缕之流露,一切动人美文,概莫能外。余读是集《幸亏还有好文字》一篇,因有此慨。

读书圈很大,读书人很多,而端正正欲把人字写好者仍属少数。因为少,故珍贵,故需要我等以虔诚之心读之爱之。读《优雅的书事》一章,作者在邵燕祥先生门外等候一节,甚是动人,类似经历余亦常有,心有戚戚,幸甚至哉。



原上草
杨明义作品

第279期